

專題論文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基於CFPS 2016–2020的追蹤數據分析

馬鏡涵^a、李耘耕^{a*}

^a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上海市，中國大陸

摘要

媒體使用偏好往往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治信任。雖然已有大量研究關注不同的媒體使用偏好對廣義政治信任的影響差異及其機制，但對於不同世代的媒介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之間關係的歷時性變化研究仍不足，也忽略了考察地方政治信任在長期過程中如何反過來影響媒體使用偏好。本研究借鑒強化螺旋模型的思路，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於2016、2018、2020年的數據，使用滯後路徑分析的策略，探究了不同的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

馬鏡涵，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政治傳播、健康傳播、數字文化研究。電郵：caterhamma@gmail.com

李耘耕(通訊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健康傳播、數字文化研究、技術政治。電郵：li.yungeng@sjtu.edu.cn

論文投稿日期：2024年4月30日。論文接受日期：2025年3月28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治信任之間的長期相互關係及其世代差異。研究發現，傳統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之間存在長期的相互強化關係，說明與開放的傳播系統相比，封閉的傳播系統更有利於政治態度的穩定與強化。政治信任者程度較高者，傾向選擇與身分認同一致的傳播內容，以維持或強化既有態度。數據分析結果表明，青年人的地方政治信任較容易受媒體使用影響；而對中年人而言，其預先持有的地方政治信任，則更可能會產生媒體選擇的效應。至於老年人，其媒體使用偏好和政治信任的互動關係則不顯著。本研究基於差序格局下的政治信任的情境，利用比較與交互的視角，驗證媒體使用與地方政治信任之間長期、綜合、互動的強化過程，及分析不同世代的差異，在中國情境中檢驗及明確了強化螺旋模型的理論命題，和其邊界並擴展了對於理論的解釋。

關鍵詞：政治信任、地方政府、強化螺旋模型、媒體使用偏好、世代差異

Special Theme Article

Examining the Reinforcing Process of Media Use Preferences With Local Political Trust Across Generation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CFPS Panel Data (2016–2020)

Jinghan MA^a, Yungeng LI^{a*}

^a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trus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uphold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media exert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on political trust. While extensive studies have discussed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twork media on political trust, there is a dearth of research exploring 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long-term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preference and political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 using a three-wave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 from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rough lagged panel analysis. Results only support the long-term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media use preference and local political trust, highlighting

Jinghan MA (M.Phil. Student).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digital culture studies. Email: caterhamma@gmail.com.

Yungeng LI (Associate Professor;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health communication, digital culture studies, techno-politics. Email: li.yungeng@sjtu.edu.cn.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30 April 2024. Accepted on 28 March 2025.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3 (2025)

that political attitud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reinforced within a closed communication system. High-trust individuals are more inclined to seek identity-consistent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s that sustain or amplify their existing attitudes. The data further reveal the different reinforcement patterns in three intergenerational groups.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hierarchical political trust, this study adopts a comparative and interactive perspective to validate the long-term, dynamic, and reciprocal reinforcement processes between media use preference and local political trust, as well as their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y testing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f the Reinforcing Spiral Model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delineates the model's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nd extends its explanatory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trust, local government, reinforcing spiral, media us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引言

政治信任是公眾對政治制度、政府、其他公共機構，以及公職人員的信任 (Van der Meer & Zmerli, 2017)。政治信任是政權合法性的主要指標，它不僅影響政治制度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更影響了公民個人的政治態度和參與 (Rahn & Rudolph, 2005)。政治信任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本，會影響政治參與、法律遵從、經濟決策等 (Kwon et al., 2013)，較低的政治信任可能會使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執行力受限，甚至危及政權 (Edmond, 2013)。政治信任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主要依據制度理論和文化理論來解釋政治信任的來源 (Mishler & Rose, 2001)。制度理論假設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是內生的，即人們對政府績效的評價與對政府應規範性期待的表現之比 (Hetherington & Husser, 2012)，公民傾向於信任保護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提高經濟發展水準和社會治理水準的政治機構 (Norris, 2012)。文化理論則假設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是外生的，不僅受到宏觀的社會文化規範的影響，也受到微觀的個體早期政治社會化經驗的影響 (Inglehart, 1997)。

媒體也是政治信任的影響因素之一，傳統媒體不僅能夠通過構建擬態環境，形塑公眾對政治的認知和態度，進而影響其政治信任，更可能作為其他因素作用於政治信任的中介變項 (張明新、劉偉，2014；盧春天、權小娟，2015)。另外，互聯網時代的媒體提供了更加多元的信息和公共參與的平台，有助於培養公民的批判質疑意識，影響政治信任 (Ceron, 2015; Lei, 2011; Mutz & Reeves, 2005; Zhou et al., 2020)。雖然媒體與政治信任的關係長期以來都是成熟且備受關注的議題，但相關的研究往往只涉及截面數據的分析，很少對長期的交互影響進行分析；第二，相關研究僅僅注重討論媒體如何影響政治信任的問題，很少討論政治信任對媒體使用偏好的影響，也很少將兩者的互動整合進同一個模型中分析；第三，前人的研究也很少涉及不同世代群體中互動關係的差異。以此為出發點，本研究試圖討論不同世代的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有何歷時性的關係；以及，不同的媒體的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的相互關係模式中的差異。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文獻綜述

中國語境下的差序政治信任

自21世紀以來，中國保持著比發達國家更高的政治信任水準，這一方面是受到強調忠誠和等級秩序的儒家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來自對經濟績效和改革的積極評價（蘇振華、黃外斌，2015；Wang, 2005；Wong et al., 2011；Yang & Tang, 2010）。不過，政治信任也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包含個體對具體機構或官員的信任，即特定政治信任（specific trust）；和對更廣泛的政治體制、制度的長期信任，即彌散政治信任（diffuse trust; Easton, 1975）。即便有實證闡明了兩種政治信任的獨立性及其在不同政治體制中的不同意義（Norris, 1999; Zhai, 2022），但由於特定政治信任與經濟治理有直接關係，相當的研究仍然通過特定政治信任來概念化政治信任（帥滿等，2021；Ceron, 2015；Su et al., 2016）。尤其是在中國，由於地方官員在執行具體政府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務中扮演重要角色，對地方政府官員的特定的信任成為了政權合法性和對政治系統的支持的核心，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眾對地方政府的信任（Li, 2016; You et al., 2022）。從對不同層級的政府的信任來看，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者識別出了兩種模式，即等級信任（對中央政府的信任高於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和金字塔型信任（對地方政府的信任高於對中央政府的信任）（Wu & Wilkes, 2018）。就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而言，儘管中央政府通過幹部人事任命、地方官員提拔晉升等方式，指導和控制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仍然對地方事務享有一定的自主權，地方政府被要求回應當地民眾的訴求，解決社會矛盾，對地方治理問題負責（Chen, 2017a; Su et al., 2016）。中國公民習慣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對比，後者常常被視為前者政治命令的執行者（Chen, 2017a）。在這一背景下，前人研究發現中國的政治信任中，存在著因層級不同而受到的信任呈梯度下降的現象（沈士光，2010），有學者將這種現象概念化為「差序政府信任」，以描述民眾對中央政府持有比地方政府更高的信任感的現象（李連江，2012）。一項基於全國性樣本的調查表明，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中國受訪者持有差序政府信任（Li, 2016）。這種差序政治信任的模式並非中國獨有，在越南和馬來西亞等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亞洲國家也有類似的模式，而在美國、韓國和日本，情況則正好相反 (Su et al., 2016; Tang & Huhe, 2016)。

迥異的政治信任模式驅使學界進一步探討中國民眾對地方政府和對中央政府持有不同的政治信任的原因。與對中國政治信任來源的解釋一致，關於差序政府信任形成的理論也側重於從政府政策行為、文化傳統和宣傳角度進行解釋 (Su et al., 2016)。Chen (2017a) 指明了地方政府的腐敗和提供的公共服務品質的影響。中央政府往往提出具吸引力的政策來培養公眾信心，地方當局卻缺乏必要的資源和執行措施，令那些相信中央政策承諾的公民常把問題歸咎於地方當局的執行不力 (Li, 2016)。另外，隨著權力的下放，政治機構和官僚不法行為的出現，降低了對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 (Tang & Huhe, 2016)。從文化角度，傳統威權的文化強調高級官員和領導的賢能，並將錯誤決策歸咎於地方官員的腐敗與濫用職權，這也影響了民眾的信任模式 (Li, 2016)。然而，多項實證證據都並不支持績效和文化的影響 (Su et al., 2016; Wu & Wilkes, 2018)。與此同時，以宣傳和審查制度作為主要工具，控制對不同層級的政治信任，當中的影響差異獲得了較為一致的支持 (呂書鵬, 2015; Chen, 2017a; Li, 2016; Su et al., 2016; Wu & Wilkes, 2018)，顯示了媒體扮演的重要角色。

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相互關係及世代差異

媒體對政治信任影響的方向的討論，長期以來都陷入「媒介乏力論」(media malaise theory) 和「良性循環理論」(virtuous circle theory) 的爭論中 (Cheng, 2020)。支持前者的相關研究表明，由於媒體集中地呈現了政治醜聞和腐敗等信息，阻礙了人們對政治和政治家的積極態度，產生了負面影響 (Mutz & Reeves, 2005)。而支持後者的相關研究表明，由於媒體提供了更豐富的途徑去獲取政治信息，當中的消費提升了民眾的政治信任 (Tworzecki & Semetko, 2012)。

就廣義的政治信任而言，不同類型的媒體接觸往往會產生差異化的影響。傳統媒體被認為是政治精英傳播官方議程，並排斥另類聲音的工具 (Woodly, 2008)，傾向再現主流的意識形態、過濾負面信息、強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化正面宣傳，從而促進並維繫民眾對政治體制的支持（張明新、劉偉，2014；盧春天、權小娟，2015；Ceron, 2015；Mattingly & Yao, 2020）。而網絡媒體的信息生產方式是自下而上、去中心化的，其匿名性和低審查門檻造就了更開放的信息流動，使用者可以在網絡媒體中使用各種方式去挪用、解讀和解構政治化的信息，並充分地了解政治事務、參與政治討論。因此網絡媒體通常被視為潛在的親民主媒體（張明新、劉偉，2014；蘇振華、黃外斌，2015；帥滿等，2021；Ceron, 2015；Lei, 2011；Zhou et al., 2020）。也有一些研究並不支持網絡媒體使用與政治信任的負向關係。Cheng (2020) 的研究表明，中國政府正在積極應對數字挑戰，在互聯網中增加意識形態宣傳的存在、加強電子政務平台的建設、鼓勵數字參與；網絡媒體使用的增加，恰恰提高了政治信任水準。楊江華和王辰宵 (2021) 的研究表明，社交媒體使用對政治信任帶來的負面後果，僅存在於突發事件或網絡公共事件的情境中。

媒體接觸對於中國地方政治信任有著特殊意義。總的來說，中國的機構媒體被認為是黨和國家的喉舌，「黨管媒體」是中國新聞事業的重要原則，媒體的目標是塑造人們的思維方式和信仰，為黨建立合法性（趙月枝，2019；Shambaugh, 2007）。諸多研究已經表明，作為一種政治控制手段的宣傳或者審查，並非一成不變地禁止所有負面信息，媒體批評仍然被允許出現在大眾媒體的話語中，主要是對地方政府或官員的批評，例如，中央媒體經常將腐敗描述為中央正在與之抗爭的地方現象（Chen, 2017b; Lorentzen, 2014; Su et al., 2016）。這種有組織的宣傳和審查在中央媒體與地方媒體的等級分異中得以實現，一般而言，只有較高級別的媒體才有資格批評較低級別的政府和官員（Chen, 2017b）。地方媒體一方面被認為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被要求掩蓋本地負面消息，維護自身形象（Kuang, 2018; Tong, 2010）；另一方面，最近的研究也發現地方媒體被加強要求與中央的宣傳規則保持一致，地方新聞報道的信息出現了較大的同質性和重複性（Zhong & Bastos, 2023）。因此，批評性報道和欄目往往出現在更高級別的媒體中。這一機制體現了中央和地方的非正式博弈，其目的是樹立良好的中央政府威信，確保地方合規並改善地方治理、提升中央政府的形象（Chen, 2017b; Kuang, 2018; Lorentzen, 2014; Su et al., 2016）。相關實證結果表明，宣傳是增加差序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政治信任的唯一變量，依賴電視等傳統媒體作為新聞來源是差序政府信任的主要預測因素，而網絡媒體的使用，增加了更平行的政治信任（呂書鵬，2015；Su et al., 2016；Wu & Wilkes, 2018）。

若將媒體對中國地方政治信任的效果，置於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比較中，實證證據表明，機構媒體的新聞消費對地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但較弱的影響；而社交媒體的新聞瀏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地方政治信任，且機構媒體對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效應，遠大於社交媒體的減弱效應（Meng & Li, 2022）。Xu等人（2022）的研究也報告了社交媒體使用與地方政治信任的負向關係，但並沒有發現傳統媒體使用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顯著相關關係。You等人（2022）利用了面板數據，檢驗互聯網使用與對地方政府官員的信任中的因果關係，並得出了互聯網的擴散力正在削弱中國政權的合法性的結論。帥滿等人（2021）的研究則發現，傳統媒體使用和互聯網使用都顯著負向影響了地方政治信任。也有研究表明，相較於報刊和電視等傳統媒體，即使網絡媒體中包含更多有關地方政府的信息，但更頻繁的網絡媒體使用並沒有對地方政治信任產生影響（Chen, 2017a）。甚至有研究表明，網絡媒體使用強度顯著正向預測了對地方政府的信任（Lu et al., 2020）。

關於媒體使用對地方政治信任影響的研究很豐富，但少有研究檢驗政治信任對人們媒體使用偏好的影響。由於個體對媒體類型和內容的選擇並非隨機的，媒體使用偏好往往反映了個體差異化的需求、情緒和品味、對不同媒體信息的信任度和依賴度，以及傾向消費某種特定類型的媒體信息（Webster & Ksiazek, 2012）。大量的研究已經討論了個人特質、媒體選擇環境等因素，在人們的媒體選擇偏好中的角色（Chyi & Lee, 2013; Panek, 2016）。人們預先持有的態度、信念和價值觀對政治內容的選擇性接觸的影響也得到了討論（Hart et al., 2009）。儘管個體能夠在線上和線下接觸到各種信息和觀點，人們仍然更喜歡消費強化或支持其意見的新聞，而不是挑戰其意見的新聞，以捍衛他們的態度、信仰和行為，網絡媒體中的算法推薦強化了這種傾向（Bakshy et al., 2015; Hart et al., 2009; Stroud, 2008）。有研究表明，個體對政黨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新信息的解釋和使用，傾向於接受一致的信息，並拒絕不一致的（Garrett, 2009; Lelkes & Westwood, 201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不過，很少有研究涉及地方政治信任對媒體使用偏好的影響。為了進一步探究這一問題，考慮到中國情境的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中信息的不同特徵，我們將地方政治信任作為一種評價，假設其也可能對媒體使用偏好產生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不同代際的人們往往在不同的教育系統、媒體和社會背景中進行社會化 (Inglehart, 2008)；年長的人們處理新信息、採納新價值觀、適應社會變革的能力較差 (Glenn, 1974)，他們的既定社會地位和資源也鼓勵他們捍衛現狀 (Jiang et al., 2022)；而年輕一代往往被認為能夠接觸到更多元的媒介，因此不同代際群體往往會持有差異化的政治信任。特定代際的媒體使用與政治信任的關係已經引起一些討論 (Gong et al., 2022)。少量研究也關注到不同代際中，媒體對地方政治信任效應的差異，Lu 等人 (2020) 的研究表明，由於年輕網民價值觀處於形成階段，更容易受到網絡信息的影響，網絡媒體使用對 18 到 29 歲年輕一代的地方政治信任的積極影響最強。考慮到不同受眾群體在不同媒體上的集中，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關係的世代差異仍然有待考察。

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和問題：

H1a：傳統媒體使用偏好會顯著正向預測地方政治信任。

H1b：網絡媒體使用偏好會顯著負向預測地方政治信任。

H2a：地方政治信任會顯著正向預測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H2b：地方政治信任會顯著負向預測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RQ1：不同世代的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關係有何異同？

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近年有學者發現，媒體使用對信念態度的影響以及既有的信念和態度對媒體使用偏好的影響並非單向的、獨立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相互聯繫、強化的 (Slater, 2007)。然而，鮮有研究從長期相互強化的視角，解釋地方政治信任與媒體使用偏好的關係。在疫情期間的一項武漢市問卷調查表明，疫情中只選擇特定類型的媒體以獲取信息的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行為，可以增強公眾對健康危機事件中官方行為的支持，但也可能導致更極端的負面態度 (Miao & Ding, 2024)。另一方面，對體制的支持和對政治制度的信心可能會強化公眾的愛國態度和中國身分，進而進一步接觸報導更多正面信息的媒體，而身分和態度又會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強化 (Huang et al., 2023; Mattingly & Yao, 2020)。

Slater (2007) 提出的「強化螺旋模型」(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探討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的理論框架。該模型將媒體使用作為一個內生變量，假設媒體使用可能影響人們的態度和信仰，其又可能影響他們選擇的媒體，強調媒體使用與信仰之間動態的、相互關聯的關係。該模型還隱含著兩個重要的理論預設。其一，並非所有的態度與媒體使用的相互關係都適合用強化螺旋模型進行解釋，該模型更側重於解釋與身分相關的態度的維繫和形成。借鑒態度可及性理論，該模型也假定個體的態度受到在特定時間點中記憶的可及性的影響，與之相關的媒體使用可能會使身分相關的態度更加突出，從而促使個體進一步尋求一致的傳播經驗 (Slater, 2007)；其二，強化螺旋效應也存在邊界，從宏觀的社會系統來看，在封閉的系統中媒體更有可能使態度和信仰走向極端，而由於受到外部力量的制約，態度在開放的系統中更可能會保持穩定 (Slater, 2007)；從個體的層面看，當身分認同受到威脅時，選擇性接觸與身分一致的內容會增加。當身分威脅減少時，選擇性接觸則會相應減少 (Slater, 2015)。

強化螺旋模型為解釋態度和信仰與媒體使用長期的互動關係提供了依據，該模型已經被實證研究用於探究不同媒體使用偏好與人們對氣候變暖、環境污染等議題的態度的長期相互關係 (Mao, 2022; Zhao, 2009)。就政治議題而言，Hmielowski 等人 (2020) 檢驗了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三個時間點中，受訪者對移民、執法和槍枝管控的意見與媒體使用的相互關係，驗證了信仰與媒體使用互相強化的效應，以及這種效應在保守派媒體和自由派媒體中的不對稱，並發現回聲室效應在保守派媒體中更加突出 (Hmielowski et al., 2020)。因此，強化螺旋模型也適合被用於解釋和分析不同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不過，很少有研究考慮到這種長期效應的世代差異，因此本研究區分了不同代際的樣本，並試圖識別長期相互關係的不同模式。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3 期（2025）

對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和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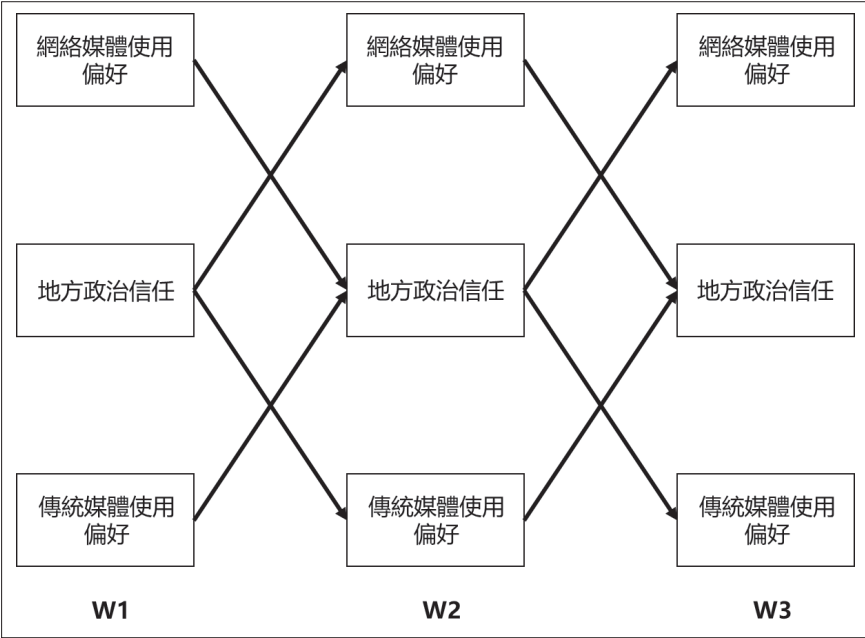
H3a：傳統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互相強化。

H3b：網絡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互相強化。

RQ2：在不同世代中，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強化模式有何異同？

綜上，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下：

圖一 研究模型圖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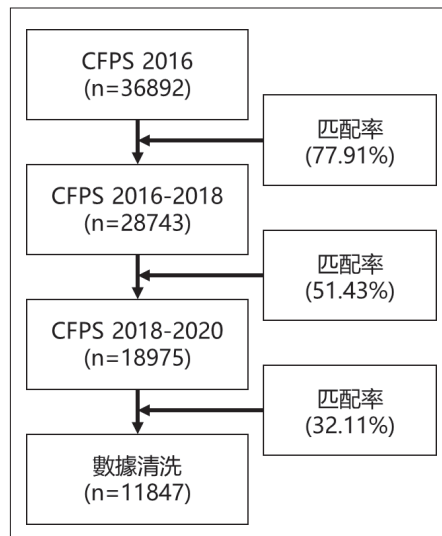
數據與樣本

本研究分析的數據集來自CFPS，這是一項對個體、家庭和社區三個層面的數據進行收集的全國性追蹤調查項目，於2010年正式開始訪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問，迄今為止已經發佈了八波數據，每一波數據包括成人庫、少兒庫、家庭關係庫等（中國家庭追蹤調查，n.d.）。本研究選擇了（研究開展時的）最近三波（2016年、2018年、2020年）CFPS數據中的成人庫作為樣本。相較於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等數據而言，其最大特徵是確定了來自25個省共16,000戶基線家庭成員及之後的子女作為永久追蹤對象。也就是說，只有採用CFPS的數據才能追蹤每個確定的樣本在訪問的時間段內的變遷。本研究依據數據集中個人身分證標認號（PID）進行數據匹配合併，並在合併後清除有數據缺失的觀測行，以及在年齡、教育等方面，存在邏輯問題的觀測項，最終得到11,847個樣本，約佔原始數據的32.11%。數據匹配與清洗過程如圖二所示。為了進一步分析媒體使用偏好與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本研究參考《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17）和國家統計局的年齡劃分標準（國家統計局網站，2022），按照受訪者在第一波調查時（2016年）的年齡將受訪者分為青年（16至35歲，即1981至2000年間出生）、中年（36至59歲，即1957至1980年間出生）和老年（60歲及以上，即1956年及以前出生）三個世代進行進一步的假設檢驗和統計分析。

圖二 原始數據匹配與清洗過程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變項測量

就地方政治信任的測量而言，受限於原有數據的題項，本研究側重於測量特定政治信任，並通過CFPS問卷中QN10025題「對本地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能打幾分？」（『本地政府官員』指當地縣/縣級市/區政府官員）」測量（0分代表非常不信任，10分代表非常信任）（ $M_{w1} = 4.99$, $SD_{w1} = 2.61$, $M_{w2} = 5.07$, $SD_{w2} = 2.64$, $M_{w3} = 5.74$, $SD_{w3} = 2.55$ ）。

與Mao (2022) 的研究一致，網絡媒體使用偏好通過CFPS問卷中KU802題（在2018年和2020年問卷中為QU802題）「互聯網對獲取信息的重要性？」測量（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 $M_{w1} = 2.47$, $SD_{w1} = 1.59$, $M_{w2} = 2.94$, $SD_{w2} = 1.62$, $M_{w3} = 3.27$, $SD_{w3} = 1.57$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通過CFPS問卷中KU803題（在2018年和2020年問卷中為QU803題）「報紙、期刊雜誌對獲取信息的重要性？」測量（1表示非常不重要，5表示非常重要）（ $M_{w1} = 1.81$, $SD_{w1} = 1.14$, $M_{w2} = 1.86$, $SD_{w2} = 1.15$, $M_{w3} = 2.14$, $SD_{w3} = 1.29$ ）。正如Mao (2022) 所述，媒體偏好得分越高，則越有可能利用此媒體獲取信息，且越重視此媒體中的信息。雖然與受訪者的實際使用頻率有所不同，但它能夠有效捕捉受訪者在面對多樣化信息渠道時的偏好，這符合本研究對比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對地方政治信任影響的目的。此外，考慮到媒體使用往往涉及多種形式，這一指標集中測量了受訪者利用特定媒體獲取信息的偏好 (Li et al., 2024)。因此，這是在CFPS數據集中有限的媒體使用相關變量中相對合適的選擇。不同世代地方政治信任、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和傳統媒體使用偏好的平均值變化參見表一。

借鑒前人研究的思路，本研究主要控制了第一波樣本的人口統計學變量、政府績效變量和個人政治參與變量 (盧春天、權小娟，2015)。人口統計學變量包括性別、受教育程度、居住地（農村/城鎮）、是否黨員、是否宗教團體成員等，具體信息如表二所示。另外，鑒於政治績效對政治信任有重要影響，且政治績效包括經濟績效和治理績效 (蘇振華、黃外斌，2015)，本研究進一步控制了樣本的收入和生活滿意度。其中，收入通過CFPS問卷中QN8011題「您的個人收入在本地屬於？」測量（1表示最低，5表示最高）（ $M_{w1} = 2.44$, $SD_{w1} = 0.98$,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M_{w2} = 2.91, SD_{w2} = 1.05, M_{w3} = 2.96, SD_{w3} = 1.05$)；而生活滿意度通過CFPS問卷中QN12012題「您對自己生活的滿意程度」測量(1表示很不滿意, 5表示很滿意)($M_{w1} = 3.62, SD_{w1} = 1.06, M_{w2} = 4.02, SD_{w2} = 0.93, M_{w3} = 4.04, SD_{w3} = 0.91$)。同時, 也有研究表明了政治參與對媒體與政治信任的關係的影響(Guo, 2022)。本研究因此選取了CFPS問卷中QN203題「過去12個月, 您是否在網站上發表過與政治問題和國家大事相關的言論」作為政治參與的控制變量。2016年的數據顯示, 答「是」的受訪者有172人(1.45%), 答「否」的有5,031人(42.47%), 未作答的有6,644人(56.08%)。

表一 地方政治信任、媒體使用偏好的平均值的世代差異及其變化(2016至2020年)

變量	2016	2018	2020
地方政治信任			
35歲以下青年	4.65	4.70	5.54
36至59歲中年	4.89	4.96	5.62
60歲及以上老年	5.66	5.82	6.28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35歲及以下青年	3.75	4.08	4.23
36至59歲中年	2.24	2.82	3.26
60歲及以上老年	1.39	1.75	2.06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35歲及以下青年	2.02	1.97	2.14
36至59歲中年	1.74	1.81	2.17
60歲及以上老年	1.81	1.86	2.14

表二 樣本描述性統計(2016年)

變量	佔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別				
1=男	48.54%			
0=女	51.46%			
年齡	45.89 ^a	15.13	16	91
1=35歲及以下青年	27.22%			
2=36至59歲中年	51.60%			
3=60歲及以上老年	21.18%			
受教育程度				
0=文盲/半文盲	18.5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3 期（2025）

變量	佔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3= 初中	24.27%			
4= 高中	32.79%			
5= 大專	14.92%			
6= 大學本科	6.25%			
7= 碩士	3.07%			
8= 博士	0.14%			
居住地				
1= 城鎮	50.59%			
2= 農村	49.41%			
是否是黨員				
1= 是	9.61%			
0= 否	90.39%			
是否是宗教團體成員				
1= 是	2.68%			
0= 否	97.32%			

註：^a 表示連續變量的平均值

分析策略

強化螺旋模型的提出者提示可以使用交叉滯後迴歸或結構方程模型來分析模型中每一條路徑的貢獻 (Slater, 2007)。基於此，本研究採用了滯後路徑分析進行數據分析，該方法有助於分析不同媒體使用的差異，同時也與強化螺旋模型的理論假設一致，將媒體作為與認同有關的態度或信仰的中介進行分析 (Hmielowski et al., 2020)。在評估媒體使用與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的過程中：為了確保控制變量對後續波次的影響都得到控制，研究者在第一波的媒體使用偏好和地方政治信任中加入了控制變量。為了控制內生變量的影響，本研究在預測第二波媒體使用時，控制第一波媒體使用；本研究還在每一波分析中將媒體使用、政治信任的殘差加入了迴歸，以確保變量之間未被解釋的波動得到適當處理。所有假設檢驗都使用了雙尾檢驗。

結果與分析

在控制年齡和上述控制變量後，本研究利用 STATA 軟件分析了整體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和網絡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就媒體使用偏好對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影響而言，結果顯示，第一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正向預測了第二波的地方政治信任，第二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也顯著正向預測了第三波的地方政治信任 (W1→W2: $B = .07$, $CI = [.03, .11]$; W2→W3: $B = .05$, $CI = [.02, .09]$)，因此 H1a 得到支持。就網絡媒體使用偏好而言，第一波的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對第二波的地方政治信任有負向影響 ($B = -.10$, $CI = [-.14, -.08]$)，但第二波的網絡媒體使用偏好，並沒有對第三波的地方政治信任產生類似影響，因此 H1b 僅得到部分支持。

就地方政治信任對媒體使用的長期影響而言，結果顯示，第一波的地方政治信任正向預測了第二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第二波的地方政治信任也正向預測了第三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W1→W2: $B = .02$, $CI = [.01, .03]$; W2→W3: $B = .03$, $CI = [.02, .04]$)，因此 H2a 得到支持。另外，第一波的地方政治信任對第二波的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B = -.02$, $CI = [-.03, -.01]$)，而第二波的地方政治信任對第三波的網絡媒體使用偏好並沒有產生類似影響，因此 H2b 得到部分支持，具體的數據如表三所示：

表三 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效應 (整體數據)

	W2 地方政治 信任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3 地方政治 信任	W3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3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1 地方政治信任	.43 (.41-.44)	.02 (.01-.03)	-.02 (-.03--.01)	—	—	—
W1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07 (.03-.11)	.34 (.32-.36)	.02 (.00-.04)	—	—	—
W1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10 (-.14--.08)	.02 (.01-.03)	.60 (.57-.61)	—	—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	—	.44 (.39-.42)	.03 (.02-.04)	-.01 (-.02-.0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3 期（2025）

	W2 地方政治 信任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3 地方政治 信任	W3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3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	—	—	.05 (.02-.09)	.34 (.32-.36)	-.03 (-.06-.01)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	—	—	-.02 (-.04-.01)	.04 (.02-.05)	.53 (.51-.54)

註：表中展示的數值是未標準化的點估計值，如果括弧內的置信區間不包含 0，則相應估計值以粗體展示

在此之後，為回答 RQ1，我們分別檢驗了三個代際中傳統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相互關係。如表四所示，在 35 歲及以下的青年人中，就媒體使用偏好對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影響而言，第一波傳統媒體使用偏好正向影響了第二波的地方政治信任 ($B = .10$, $CI = [.03, .18]$)，而第二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並未顯著預測第三波的地方政治信任。另外，結果並不支持任何一波中青年人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對他們所持的地方政治信任的影響。就青年地方政治信任對媒體使用的長期影響而言，結果顯示，第一波地方政治信任正向預測了第二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第二波中也顯示了類似的模式 ($W1 \rightarrow W2$: $B = .03$, $CI = [.01, .04]$; $W2 \rightarrow W3$: $B = .03$, $CI = [.01, .04]$)。然而，數據結果並不支持第一波地方政治信任對網絡媒體使用偏好的影響，但我們發現，第二波地方政治信任顯著正向預測了第三波的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B = .02$, $CI = [.01, .03]$)。

表四 媒體使用偏好與政治信任的長期效應 (35 歲及以下青年)

	W2 地方政治 信任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3 地方政治 信任	W3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3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1 地方政治信任	.42 (.38-.45)	.03 (.01-.04)	.00 (-.01-.02)	—	—	—
W1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10 (.03-.18)	.25 (.22-.28)	-.02 (-.05-.01)	—	—	—
W1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01 (-.07-.05)	-.03 (-.06--.01)	.34 (.31-.36)	—	—	—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W2 地方政治 信任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3 地方政治 信任	W3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3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2 地方政治信任	—	—	—	.45 (.42–.48)	.03 (.01–.04)	.02 (.01–.03)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	—	—	.04 (–.03–.10)	.33 (.39–.37)	–.01 (–.04–.02)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	—	—	–.01 (–.07–.06)	–.08 (–.12–.05)	.30 (.27–.33)

註：表中展示的數值是未標準化的點估計值，如果括弧內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則相應估計值以粗體展示

在36至59歲的中年人中，就媒體使用偏好對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影響而言，結果支持第二波傳統媒體使用偏好對第三波地方政治信任的正向影響 ($B = .06$, $CI = [.01, .11]$)，以及第一波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對第二波地方政治信任的負向影響 ($B = -.06$, $CI = [-.10, -.01]$)。就地方政治信任對媒體使用的長期影響而言，結果顯示，第一波的地方政治信任顯著正向預測了第二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而第二波的地方政治信任同樣顯著正向預測了第三波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W1 \rightarrow W2$: $B = .02$, $CI = [.01, .02]$; $W2 \rightarrow W3$: $B = .04$, $CI = [.03, .06]$)。另外，我們發現了第一波地方政治信任對第二波網絡媒體使用偏好的負向影響 ($B = -.02$, $CI = [-.03, -.01]$)。具體數據參見表五。

表五 媒體使用偏好與政治信任的長期效應 (36至59歲中年)

	W2 地方政治 信任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3 地方政治 信任	W3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3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1 地方政治信任	.43 (.40–.45)	.02 (.01–.02)	–.02 (–.03–.01)	—	—	—
W1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06 (.00–.11)	.32 (.30–.35)	.06 (.02–.09)	—	—	—
W1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06 (–.10–.01)	.04 (.03–.06)	.48 (.45–.50)	—	—	—
W2 地方政治 信任	—	—	—	.44 (.42–.46)	.04 (.03–.06)	.01 (.00–.0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3 期（2025）

	W2 地方政治 信任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3 地方政治 信任	W3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3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2 傳統媒體使 用偏好	-	-	-	.06 (.01-.11)	.31 (.29-.34)	.01 (-.02-.04)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	-	-	.01 (-.03-.05)	.07 (.06-.10)	.41 (.38-.43)

註：表中展示的數值是未標準化的點估計值，如果括弧內的置信區間不包含 0，則相應估計值以粗體展示

如表六所示，就 60 歲以上的老年人而言，我們並沒有在任何一波中發現媒體使用偏好對地方政治信任的顯著影響，或是地方政治信任對媒體使用偏好的顯著影響。總的來看，H1a 在青年和中年中僅得到部分支持；H1b 在青年中不顯著，但在中年中得到部分支持。H2a 在青年和中年中得到支持；H2b 在青年和中年中僅得到部分支持。在老年人中，H1ab 和 H2ab 都沒有得到支持。

表六 媒體使用偏好與政治信任的長期效應（60 歲及以上老年）

	W2 地方政治 信任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3 地方政治 信任	W3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W3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W1 地方政治信任	.40 (.36-.41)	.01 (.00-.03)	-.01 (-.02-.01)	-	-	-
W1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03 (-.06-.11)	.46 (.42-.50)	.06 (.01-.10)	-	-	-
W1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07 (-.18-.03)	.01 (-.04-.06)	.48 (.43-.53)	-	-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	-	.41 (.38-.45)	.01 (-.01-.03)	.00 (-.02-.03)
W2 傳統媒體 使用偏好	-	-	-	.02 (-.06-.09)	.37 (.33-.42)	-.03 (-.07-.02)
W2 網絡媒體 使用偏好	-	-	-	-.02 (-.06-.10)	.05 (.01-.09)	.42 (.38-.47)

註：表中展示的數值是未標準化的點估計值，如果括弧內的置信區間不包含 0，則相應估計值以粗體展示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最後，本研究利用 nlcom 命令檢驗了媒體使用偏好與政治信任之間的長期間接關係，以分析整個強化過程。就整體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與網絡媒體使用偏好的比較而言，四條強化效應路徑中有兩條是顯著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會正向影響地方政治信任，提高的政治信任又顯著正向預測了後續的傳統媒體使用偏好（點估計 = .0022，CI = [.0011, .0033]）。地方政治信任會加強傳統媒體使用偏好，這種偏好又會進一步提高後續的地方政治信任（點估計 = .0010，CI = [.0003, .0016]），因此在整體數據中 H3a 得到支持，拒絕 H3b。

為了回答 RQ2，我們也比較了各個世代的強化過程。在各世代中，結果僅支持了 35 歲及以下青年中傳統媒體使用偏好作為起點影響地方政治信任進而影響傳統媒體使用偏好的強化螺旋效應（點估計 = .0031，CI = [.0008, .0053]）；以及 36 至 59 歲中年中政治信任，作為起點影響傳統媒體使用偏好，進而影響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關係（點估計 = .0011，CI = [.0001, .0021]）。也就是說，對青年一代來說，越偏好使用傳統媒體，則具有越強的地方政治信任，而這種信任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傳統媒體的使用偏好；而對中年一代而言，越強的地方政治信任會增強他們對傳統媒體的偏好，進而進一步增強了他們的地方政治信任。相較於中年，青年人的地方政治信任受媒介影響更大，而對中年人而言，則是預先持有的地方政治信任導致的媒介選擇效應更強。具體數據詳見表七。

表七 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間接關係

總體的長期間接關係	
W1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0022 (.0011-.0033)
W1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0008 (-.0001-.0017)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10 (.0003-.0016)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04 (-.0001-.0010)
35 歲及以下青年	
W1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0031 (.0008-.0053)
W1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0001 (-.0013-.0010)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09 (-.0006-.0025)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01 (-.0003-.0002)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3 期（2025）

總體的長期間接關係	
36 至 59 歲中年	
W1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0025 (.0003–.0047)
W1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0005 (–.0012–.0001)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11 (.0001–.0021)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01 (–.0006–.0004)
60 歲及以上老年	
W1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0002 (–.0005–.0009)
W1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2 地方政治信任 → W3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0002 (–.0014–.0011)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傳統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02 (–.0007–.0012)
W1 地方政治信任 → W2 網絡媒體使用偏好 → W3 地方政治信任	–.0001 (–.0006–.0004)

註：表中展示的數值是未標準化的點估計值，如果括弧內的置信區間也不包含 0，則相應估計值以粗體展示

結論與討論

2016、2018、2020 年的三波 CFPS 縱向數據很明顯地展示了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在近年來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這種趨勢反映在每個代際中，並且對越年輕的群體而言，網絡媒體的重要性越高。只有在 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在每個時期都低於傳統媒體使用偏好。儘管使用報刊的偏好在中年和老年群體中也在不斷增加，但相較於網絡媒體而言，報刊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低。縱向數據也表明，地方政治信任在每個年齡段中，都呈現上升趨勢，尤其是在 2020 年呈現出了較大的提升。另外，老年群體的地方政治信任，為每個年齡段中最高；青年群體的地方政治信任，則是每個年齡段中最低的。雖然我們對整體的強化螺旋效應的檢驗結果，證實了傳統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但是這種模式並未出現在每個代際中。在 35 歲及以下的青年人中，結果僅支持傳統媒體使用偏好會正向影響地方政治信任，繼而強化傳統媒體使用偏好的路徑；在 36 至 59 歲的中年人中，結果僅支持地方政治信任會正向影響傳統媒體使用偏好，進而強化地方政治信任的路徑；而在 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結果並不支持任何一條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同時，我們也沒有在任何一個代際中發現網絡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

首先，本研究將媒體使用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影響，和地方政治信任對媒體選擇的影響整合，進行同一個框架內進行驗證，描述了中國的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之間的長期相互關係。與帥滿等人 (2021) 的結論相反，我們的整體結果驗證了傳統媒體使用偏好能夠加強地方政治信任，並從長期的角度證實了 Meng 和 Li (2022) 以及 Lu 等人 (2020) 的研究結果。說明了傳統官方媒體在影響公共政治價值觀，和宣傳政府績效方面取得的成效顯著 (Chen & Sun, 2019)。正如 Li (2016) 所述，對地方政府的明確不信任，可能反映出中央政治信任的不穩定性。即便在傳統媒體中可能存在批評地方政府的負面報導 (Chen, 2017b; Kuang, 2018; Lorentzen, 2014; Su et al., 2016)，在所研究的時期內，傳統媒體並不會削弱地方政治信任，繼而對中央政治信任造成潛在的威脅。這也與強化螺旋模型的理論假設一致，封閉的媒體或宣傳系統在塑造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些系統中的媒體運動中，增加了公眾對政治制度的信心 (Mattingly & Yao, 2020; Slater, 2015)。

儘管對整體數據的分析結果，展示了特定時期內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對地方政治信任的負向影響，但新信息通信技術並沒有帶來日益激進的政治身分和反對態度的極化 (Fang & Repnikova, 2018; Garrett, 2009)。這可以從網路空間的審查制度來解釋，它有效抑制了網路政治批評對政治合法性的持續而累積的侵蝕作用。另一方面，正如 Slater (2007) 所言，在開放的系統中，人們可以與不同的身分互動，與不同的意見相遇，更不可能帶來態度和信仰的極化。此外，由於網絡媒體中的線上交流很少改變事實的社會福利分配或協調不同群體間的關係，其很難帶來政治態度的極化 (Huang et al., 2023)。

結果也顯示，較高的地方政治信任會增加傳統媒體的使用偏好，進而導致預先持有的政治態度的強化。強化螺旋模型不僅將政治信任作為一種態度和評價，也將其作為一種影響人們媒介選擇偏好的身分，與身分一致的傳播有助於維繫並增強這種身分認同，並減輕對身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分威脅的感知 (Slater, 2007)。持有較高政治信任的人，通過使用傳統媒體持續消費與其態度相符的正面信息，鞏固了對地方政府的認同感。有趣的是，我們並沒有在地方政治信任與網絡媒體使用偏好的互動中發現類似模式。Hmielowski 等人 (2020) 認為，美國保守群體的思想較為封閉，並傾向於消費黨派性較強的媒體，因而更容易形成意識形態的強化；自由主義者持有更開放的思想，較信任黨派性較弱的媒體，很難形成極化的思想。在中國，可能由於低政治信任者持有更開放的思想、身分感知不強烈，也可能由於在中國網絡媒體中有大量被審核過濾後的信息，以及小量滿足他們態度一致性的信息；持有較低政治信任者接觸網絡媒體，並形成對地方政府更負面政治評價的路徑不顯著。

此外，本研究對比了不同代際的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關係模式的差異。結果表明，在青年人群體中，長期效應以傳統媒體使用偏好為起點；在中年人群體中，長期效應則以地方政治信任作為起點。這說明了青年人在價值觀形成的階段，其政治態度具有更強的可塑性，也更容易受到媒介信息的影響 (Lu et al., 2020)，對於相對穩定的政治信任水準的中年人而言，他們更傾向於基於已有的價值觀進行媒體選擇以強化其價值觀。印證了 Jiang 等人 (2022) 的結論，即人們在青年到中年過渡期間，不斷鞏固他們青年時期建立的觀點，變得越來越保守。另外，就未成立的長期間接關係而言，我們的數據顯示，對於青年人群體而言，較高的地方政治信任與較強的網絡媒體選擇偏好相關；對於中年人而言，較高的政治信任卻與較弱的網絡媒體使用偏好相關。同時，網絡媒體選擇偏好可能會負向影響他們的地方政治信任。這一差異顯示了中國網絡媒體中既能夠吸引年輕人群體親政府的新媒體內容 (Fang & Repnikova, 2018; Huang et al., 2023)；也有指控地方政府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負面內容，這些內容可能會破壞地方政治信任 (Xu et al., 2022)，這也導致反對主流傳統媒體的中年人更願意用網絡媒體搜索信息 (Best et al., 2005)。總的來說，不管社交媒體如何促進公民文化，信息多樣性的程度仍會被控制在不破壞當前的政治制度的範圍內 (King et al., 2013)。最後，沒有發現老年群體中的類似模式，可能是由於總體而言老年人媒體使用較少，同時他們已經形成了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較為固定的信念，因此較少受到外部信息的影響，尤其是媒介的短期影響；另外他們可能已經有了較為固定的信息獲取渠道，並不會依賴政治態度進行媒體選擇。

總的來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理論貢獻。第一，本研究通過使用三波追蹤數據，從因果邏輯上系統地、全面地驗證了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不僅討論了媒體使用偏好對地方政治信任的影響，也討論了地方政治信任對媒體使用偏好的影響；並在同一個模型中對比了傳統媒體使用偏好和網絡媒體使用偏好的角色。這不僅彌補了現有文獻中大多基於橫截面數據的推斷局限，也納入了對比的視角，在中國的情境中檢驗了強化螺旋模型提出的理論命題。傳統媒體使用偏好以及預先持有的地方政治信任，是驅動強化過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證實了官方宣傳與意識形態鞏固的因果關係；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具有較高地方政治信任的中國民眾，會選擇與態度和立場一致的信息，來源維持身分一致性的傾向。網絡媒體使用偏好僅在特定時期和群體中，對地方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侵蝕作用，這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網絡空間的治理與管控的效果，也說明了相較於封閉的系統，開放的系統更難以形成政治態度的強化。第二，通過納入代際差異的視角，本研究進一步揭示了不同代際如何在複雜信息環境中，形成和鞏固其政治態度的動態過程，明確了強化螺旋效應如何適用於不同代際中；同時也為該模型提供了歷史時間維度的補充，識別了處於不同政治社會化階段，和媒介發展背景的人們的不同強化螺旋機制。第三，本研究的因果推斷，並未證實既有的研究關於「宣傳可能削弱地方政治信任」的假設，這至少說明了在數據涉及的週期內，整合積極信息增強地方政治信任也是宣傳的重要目標。本研究的結果也提示，宣傳對差序政治信任的影響效果並不絕對，還受到媒介渠道、代際差異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將媒介渠道和代際差異帶入對差序政治信任的討論，也是對該理論的一個重要補充和推進。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在變量測量方面，受限於原始數據集，僅依靠自我報告量表，測量媒體使用偏好，可能會受到社會期望效應和回憶偏差的影響；同時，利用感知媒體重要性，測量媒體使用偏好可能導致測量與概念的不一致性，後續研究中若有條件應考慮加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入頻率和時長等客觀測量，確保所使用的工具更符合「使用」和「偏好」的概念。此外，僅依靠對地方政府官員的信任，測量地方政治信任測量範圍較狹隘，維度較為單一，後續研究應盡可能採用多維度測量。在分析方面，同樣受限於原始數據集，本研究滯後時間的長度固定為兩年，而事實上不同媒介的選擇性效應具有特殊性，驅動相互強化螺旋效應的兩種因素也並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滯後時間，對態度或行為的影響可能要比對媒體選擇的影響更為久遠(Slater, 2007)。可能的外部事件(如新冠疫情)產生的歷史效應或個人文化因素(如人們的價值觀)產生的混淆效應，都會導致本研究因果推斷的結果偏差(Meng & Li, 2022; Vermeer et al., 2022)。從研究設計方面看，本研究所討論的關係也可能因代際之外的其他人口統計學因素的差異而不同，不同社會群體中媒體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問題，應進一步深入探討，尤其是居住地(城鄉)、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響。需要強調的是，媒體與政治信任的關係是複雜的、受多層次因素影響的。由於本研究是對長期縱向數據的分析，並不能對具體的機制進行解釋，仍需截面數據研究對媒體的角色進行更細緻的分析。研究對媒體的分類也較為簡單，而人們的媒體使用偏好往往呈現出基於內容、平台的差異性，未來的研究應該擴展到對更加多元的媒體內容形式的分析中。另外，地方政治信任可能也會受到地方媒體使用的影響，而本研究未能區分中央媒體與地方媒體的影響差異。未來研究可通過收集地方媒體使用數據，進一步探討地方和國家媒體對地方政治信任的差異化影響。最後，由於數據變量中沒有與中央政府政治信任的對比項，無法對比媒體使用偏好，與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和地方政治信任的長期相互關係。如果數據允許，未來的研究也有必要加入不同類型的政治信任進行比較。

致謝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和編輯部對本文的建設性意見。感謝季程遠教授、楊楠女士和梁笑女士對本文方法論和結果解釋方面富有洞見的評論。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Acknowledgement

The authors want to thank the two anonymous reviewers and the editorial team for their constructive feedback o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Prof. Ji Chengyuan, Ms. Yang Nan, and Ms. Liang Xiao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regarding the 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未獲研究項目經費資助。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not funded by any project grant.

ORCID

馬鏡涵 (Jinghan MA) <https://orcid.org/0000-0001-6986-2141>

李耘耕 (Yungeng LI) <https://orcid.org/0000-0001-9789-8416>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中國家庭追蹤調查 (n.d.)。〈中國家庭追蹤調查 (CFPS)〉。取自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網站, <http://www.issf.pku.edu.cn/cfps/index.htm>。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n.d.). *CFP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issw.pku.edu.cn/cfps/index.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April 13).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issue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Youth Development Plan (2016–2025)*. The State Counci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_5185555.htm#1.

呂書鵬（2015）。〈差序政府信任：概念、現狀及成因——基於三次全國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學海》，第4期，頁148–157。

Lu, S. (2015). 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Conceptualization, current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using three nationwide survey. *Academia Bimestries*, 4, 148–157.

李連江（2012）。〈差序政府信任〉。《二十一世紀》，第131期，頁108–114。

Li, L. (2012). Hierarchical trust in government. *Twenty-First Century*, 131, 108–114.

沈士光（2010）。〈論政治信任——改革開放前後比較的視角〉。《學習與探索》，第2期，頁60–65。

Shen, S. (2010). On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fore and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Study & Exploration*, 2, 60–65.

帥滿、羅家德、郭孟倫（2021）。〈媒介使用對地方政府信任的作用機制研究〉。《國際新聞界》，第2期，頁27–46。

Shuai, M., Luo, J., & Guo, M. (2021). Research on mechanisms of media use to local government trust.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 27–46.

國家統計局（2022年6月27日）。〈我國中年人群年齡範圍，老年人群年齡範圍〉。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s://www.stats.gov.cn/hd/lyzx/zxgk/202207/t20220704_1858761.html。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2, June 27). *Age range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opulations in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ts.gov.cn/hd/lyzx/zxgk/202207/t20220704_1858761.html.

張明新、劉偉（2014）。〈互聯網的政治性使用與我國公眾的政治信任——一項經驗性研究〉。《公共管理學報》，第1期，頁90–103、141–142。

Zhang, M., & Liu, W. (2014). Political internet use and Chinese public's political trus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1, 90–103, 141–142.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 楊江華、王辰宵 (2021)。〈青年網民的媒體使用偏好與政治信任〉。《青年研究》，第4期，頁1-10、94。
- Yang, J., & Wang, C. (2021). The young netizens' preference for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trust. *Youth Studies*, 4, 1-10, 94.
- 趙月枝 (2019)。《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唐山出版社。
- Zhao, Y. (2019).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a*. Tangshan Publications Inc.
- 盧春天、權小娟 (2015)。〈媒介使用對政府信任的影響——基於CGSS2010數據的實證研究〉。《國際新聞界》，第5期，頁66-80。
- Lu, C., & Quan, X. (2015). Media use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GSS2010 data.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5, 66-80.
- 蘇振華、黃外斌 (2015)。〈互聯網使用對政治信任與價值觀的影響：基於CGSS數據的實證研究〉。《經濟與社會體制比較》，第5期，頁113-126。
- Su, Z., & Huang, W. (2015). The internet's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trust and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2010 data. *Comparative Economic & Social Systems*, 5, 113-126.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Bakshy, E., Messing, S., & Adamic, L. A. (2015). 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 *Science*, 348(6239), 1130-1132.
- Best, S. J., Chmielewski, B., & Krueger, B. S. (2005). Selective exposure to online foreign news during the conflict with Iraq.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0(4), 52-70.
- Ceron, A. (2015). Internet, news,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online media outlet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5), 487-503.
- Chen, D. (2017a). Local distrust and regime support: Sources and effects of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70(2), 314-326.
- Chen, D. (2017b).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or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Media criticism and central-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China. *Modern China*, 43(6), 620-645.
- Chen, J., & Sun, L. (2019). Media influence on citizens' government trust: A cross-sectional data analysis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2(13), 1122-1134.
- Cheng, X. (2020). Malaise effect or virtuous effect? The dynamics of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 1995-2016.
- Chyi, H. I., & Lee, A. M. (2013). Online news consumption: A structural model linking preference, use, and paying intent. *Digital Journalism*, 1(2), 194-211.

- Easton, D.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435–457.
- Edmond, C. (2013).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coordination, and regime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0(4), 1422–1458.
- Fang, K., & Repnikova, M. (2018). Demystifying “Little Pink”: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gendered label for nationalistic activists in China. *New Media & Society*, 20(6), 2162–2185.
- Garrett, R. K. (2009). Echo chambers online?: Politically motivated selective exposure among Internet news use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2), 265–285.
- Glenn, N. D. (1974). Aging and conservatism.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415(1), 176–186.
- Gong, Q., Verboord, M., & Wang, Y. (2022). Media usage and political trust among young adults in China: The role of media credibility, trust in sources and political membership.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18(3), 301–321.
- Guo, Y. (2022). How do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 government trust among Chinese youth groups? A chain mediation study based on trust theory and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In L. Hagen, M. Solvak, & S. Hwang (Eds.),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pp. 144–150).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Hart, W., Albarracín, D., Eagly, A. H., Brechan, I., Lindberg, M. J., & Merrill, L. (2009). Feeling validated versus being correct: A meta-analysis of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4), 555–588.
- Hetherington, M. J., & Husser, J. A. (2012). How trust matters: The changing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2), 312–325.
- Hmielowski, J. D., Hutchens, M. J., & Beam, M. A. (2020). Asymmetry of partisan media effects?: Examining the reinforcing process of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media with political belief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7(6), 852–868.
- Huang, Z., Yang, Z., & Meng, T. (2023). National identity of locality: The state,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cyber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8(1), 51–83.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F. (2008). 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1(1–2), 130–146.
- Jiang, A., Wang, Z., & Zhang, T. H. (2022). Radicalizing and conservatizing: Ageing effects on political trust in Asia, 2001–2016.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2(2), 665–681.
- King, G., Pan, J., &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 Kuang, X. (2018). Central state vs. local levels of government: Understanding news media censorship in China.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 154–171.
- Kwon, S. W., Heflin, C., & Ruef, M. (2013).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6), 980–1008.
- Lei, Y. W. (201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Netize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8(3), 291–322.
- Lelkes, Y., & Westwood, S. J. (2017). The limits of partisan prejudice. *Journal of Politics*, 79(2), 485–501.
- Li, L. (2016). Reassessing trust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five national surveys. *China Quarterly*, 225, 100–121.
- Li, X., Zhang, S., & Song, X. (2024).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and involvement on residents' attitudes to healthcare in China: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 *PLoS ONE*, 19(8), 1–16.
- Lorentzen, P. (2014). China's strategic censo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2), 402–414.
- Lu, H., Tong, P., & Zhu, R. (2020). Does internet use affect netizens' trust in governmen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49(1), 167–185.
- Mao, Y. M. (2022). Media use and perceived pollution: Does a reinforcing spiral exi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2393–2409.
- Mattingly, D., & Yao, E. (2020). How propaganda manipulates emotion to fuel nationalism: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14716.
- Meng, X., & Li, Y. (2022). Par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news consumption and hierarchical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Journalism Practice*, 16(7), 1363–1382.
- Miao, B., & Ding, H. (2024). Testing influences of openness, conscientiousness, nationalism, media diversity, social class, and informational echo chambers on support for official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Wuhan in November, 2020.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1–13.
- Mishler, W., & Rose, R.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1), 30–62.
- Mutz, D. C., & Reeves, B. (2005). The new videomalaise: Effects of televised incivility on political tru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1), 1–15.
- Norris, P.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ris, P. (2012).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nek, E. (2016). High-choice revisited: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news selection behavior in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3(4), 836–85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3期（2025）

- Rahn, W. M., & Rudolph, T. J. (2005). A tale of political trust in American cit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9(4), 530–560.
- Shambaugh, D. (2007).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57, 25–58.
- Slater, M. D. (2007). Reinforcing spirals: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media selectivity and media effects and their impact on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cial ident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17(3), 281–303.
- Slater, M. D. (2015). 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 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content expos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attitudes. *Media Psychology*, 18(3), 370–395.
- Stroud, N. J. (2008).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 Revisiting the concept of selective exposure. *Political Behavior*, 30(4), 341–366.
- Su, Z., Ye, Y., He, J., & Huang, W. (2016). Constructed hierarchical government trust in China: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olitical effects. *Pacific Affairs*, 89(4), 771–794.
- Tang, M., & Huhe, N. (2016). The variant effect of decentralization on trust in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Asia. *Political Studies*, 64(1), 216–234.
- Tong, J. (2010). The crisis of the centralized media control theory: How local power controls media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2, 925–942.
- Tworzecki, H., & Semetko, H. A. (2012). Media use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in three new democracies: Malaise versus mobilization in the Czech Republic, Hungary, and Po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7(4), 407–432.
- van der Meer, T. W. G., & Zmerli, S. (2017). The deeply rooted concern with political trust. In S. Zmerli & T.W.G. van der Meer (Eds.), *Handbook on political trust* (pp. 1–15).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Vermeer, S., Kruikemeier, S., Trilling, D., & de Vreese, C. (2022). Using panel data to study political interest, news media trust, and news media us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ism Studies*, 23(5–6), 740–760.
- Wang, Z. (2005).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1), 155–171.
- Webster, J. G., & Ksiazek, T. B. (2012). The dynamics of audience fragmentation: Public attention in an age of digit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1), 39–56.
- Wong, T. K. Y., Wan, P. S., & Hsiao, H. H. M. (2011). 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 compa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3), 263–281.
- Woodly, D. (2008). New competencies in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Blogs, agenda setting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ublic Choice*, 134(1), 109–123.
- Wu, C., & Wilkes, R. (2018). Local–national political trust patterns: Why China is an excep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9(4), 436–454.

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

- Xu, P., Ye, Y., & Zhang, M. (2022).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media, social media, and foreign media on hierarchical levels of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Global Media and China*, 7(3), 357–377.
- Yang, Q., & Tang, W. (2010).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2(3), 415–436.
- You, Y., Yu, S., & Xiao, S. (2022). Once accessing the Internet, less trusting of local officials?: Evidence from a panel survey in China. *Society*, 59(6), 723–734.
- Zhai, Y. (2022). Quality of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support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88(2), 411–427.
- Zhao, X. (2009). Media use and global warming perceptio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5), 698–723.
- Zhong, J., & Bastos, M. (2023). Local news as propaganda: Precarization and media control in *Qinghai News*. *Journalism Practice*, 1–18.
- Zhou, D., Deng, W., & Wu, X. (2020). Impacts of internet use on political trust: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56(14), 3235–3251.

本文引用格式

馬鏡涵、李耘耕 (2025)。〈世代差異視角下媒體使用偏好與地方政治信任的強化螺旋效應——基於CFPS 2016–2020的追蹤數據分析〉。《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3期，頁145–177。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Ma, J., & Li, Y. (2025). Examining the reinforcing process of media use preferences with local political trust across generation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CFPS panel data (2016–2020).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3, 145–177.